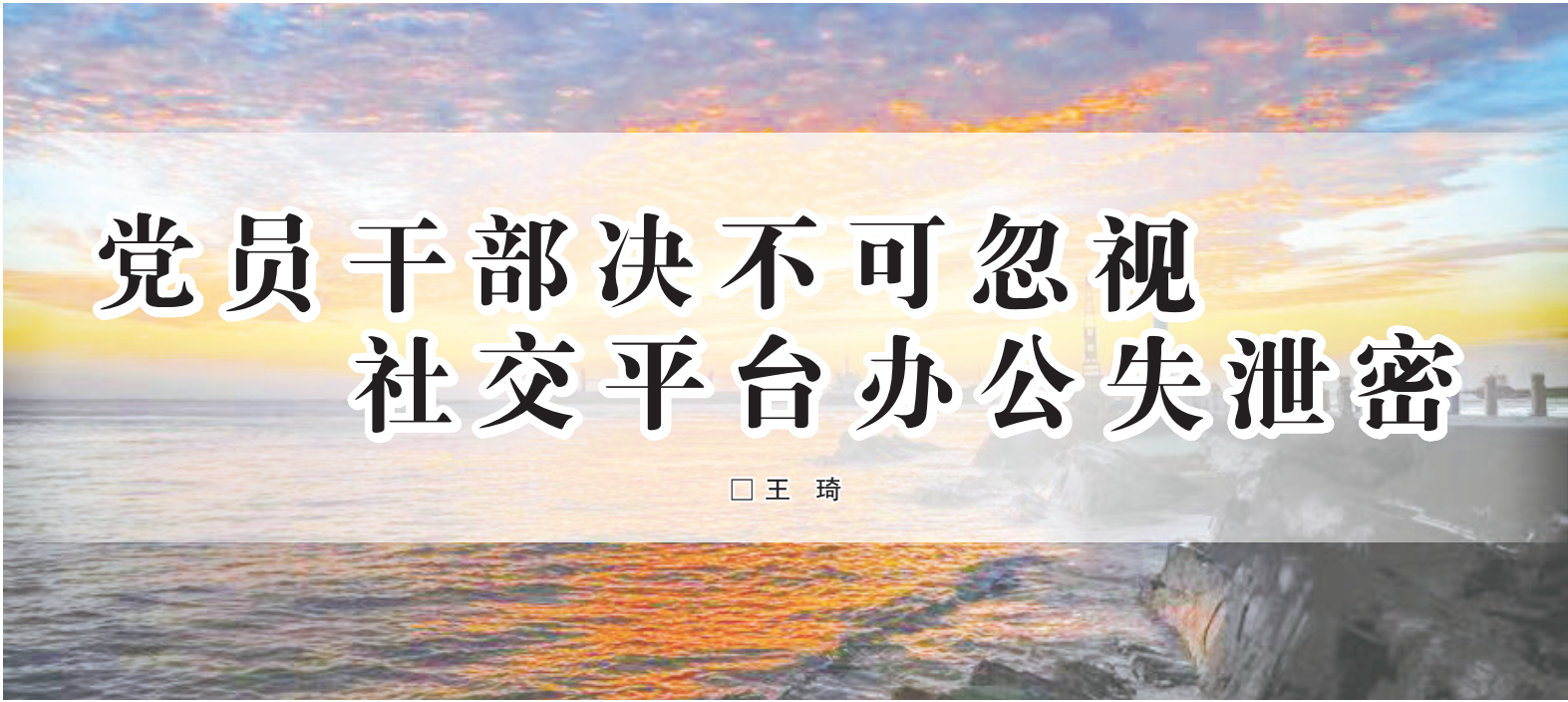




案 例

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一则关于成都市都江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某泄露工作信息的案例。李某在参加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过程中，擅自用手机拍照，并将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私人微信，造成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外泄，带来严重不良影响。成都市纪委对李某立案审查。国家保密局公布了一则关于某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茅某利用社交平台传输涉密文件的案例。2015年11月，茅某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正准备传阅的机密级文件，内容与某重点案件的处理意见有关。茅某的姐姐正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茅某将该机密级文件用手机偷拍后，通过社交平台发给她姐，随后其姐便将图片发到该案当事人的微信群中，导致大范围泄密。事件发生后，有关单位给予茅某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其姐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两起案件均是“手指间”的泄密，危害严重，党员干部对此必须高度警惕，不能丝毫忽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发展，社交平台软件以其用户量大、操作简单、便捷高效等特点成为行政办公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但是，在平台数据的传输过程中，利用社交平台传递信息、文件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用非法技术手段侵入并获取信息，进而窃取国家、工作机密。一旦发生泄密，涉密信息会“裂变”式扩散。近几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违规通过社交平台软件发布、传输、处理涉密文件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

社交平台办公泄密大部分情况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责任人主观上是过失心态，或是缺乏常识，不知其不可为；或是明知其不可为，却因侥幸心理而为之。有人认为，信息只“定向”发送到特定地工作群，群里用户也都是应当知晓该信息的人，甚至只“点对点”地传给个人；或者为起草材料用图文识别软件转化只是省点打字的时间；又或者在公众号、朋友圈只发布涉密文件中的一个图片、一两句话，谈不上泄密。这都与责任人的主观状态密切相关，有的是因为亲情、友情、学习、面子等私人原因，将工作秘密作为实现个人意图的工具，进而导致泄密。有的是因为“懒惰”，出现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等情况从而导致泄密。

保密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特殊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进入新时代，保守机密是党的生命，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名党员的共同责任，是党的一项重要纪律。因此，党纪国法都对保密工作做出了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泄

露、扩散或者打探、窃取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私自留存涉及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方面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依法定罪处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这意味着任何一名党员干部一旦泄露国家秘密，都将会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甚至会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可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党绝对忠诚的必然要求，需要每位党员干部增强保密意识，身体力行共担保密之责。

保密部门组织查办的此类泄密案件往往存在某种“客观因素”，比如，待办公务紧急，其他通信方式不畅，无法当面交办或报告，技术失误乃至领导指示使用社交平台软件传送等，实际上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心存侥幸。使用社交平台办公作为一种技术进步

和发展趋势，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并不在于使用社交平台本身，社交平台办公导致泄密的真正原因还是机关单位保密管理松懈，对党员干部职工保密教育培训不够，党员干部保密意识淡薄。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 的保密意识，始终绷紧保密之弦，涉及秘密信息、敏感信息的任何一项工作不要怕麻烦，不能只图效率，要严格按照保密工作规范执行，切不可为了省时省力自作聪明。与工作相关的事项和信息审慎发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政府机关要加强保密宣传教育，把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层层传导到每一个人。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做到经常提醒，党员干部不仅要保证自己不使用微信传密，发现此类情况还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原则上不提倡使用微信办公，因工作需要组建的工作群，交流内容应严格限定为周知性的一般信息，禁止传播一切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禁止涉密人员使用微信办公。将涉密载体全过程管理与智能手机使用保密管理结合起来，从源头上消除涉密文件数字化的隐患。对于失泄密者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完善保密工作要求，加强保密监督。布好保密防线，督促掌握秘密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保密要求，禁止通过互联网应用识别、转换涉密材料；特殊情况需要通过社交平台传达文件、部署工作的，要求进行全面彻底的脱秘脱敏处理，并逐级请示文件产生的机关单位。



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把“领导基层治理”纳入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的职责中，强调了在加强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进入新时代，各地方党委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探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创新路径，涌现出了大量好的做法和经验，拉近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广大群众在城市生活中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例如：

南京通过建立6228个网格党支部、10697个网格党小组，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治理更近距离；通过实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度，打破驻区单位壁垒，让基层治理更有力量；通过完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责任体系，让基层治理更有保障，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点 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基层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更个性化、更高品质的要求，共同推动着城市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城市居委会设立党组织，拉开了城市基层社会开展党建工作的序幕。之后，伴随着1986年“社区”概念的引入，城市基层社会也进入了“社区党建”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基层工作，每到一地均要到社区、进小区、访居民，多次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在不同场合对基层党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2017年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了“城市基层党建”的概念，标志着城市党建工作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成效明显的创新实践，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城市基层治理，旨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以南京网格党组织为例，综合其他多地的探索实践，组织创新、共驻共建、系统推进是做好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要素。

通过组织创新不断提升党组织覆盖面。城市人群结构的变化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党组织在组织设置上做出相应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一是组织下沉。由于目前的社区一般规模较大，把党组织建在社区居委会的传统方式，导致党组织与普通群众之间距离太远，为此很多地方在推行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将党组织同步建在网格上，使党的组织下沉一线。还有的地方在原来“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的基础上，扩展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个层级，真正将党的组织延伸到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二是主动覆盖新领域新群体。针对城市基层日益增多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各地积极加大楼宇党建、园区党建、商圈党建的工作力度，通过党组织将区域内的“两新组织”联结起来，将党员管理起来，实现了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针对平台经济产生的大量新就业群体（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各地积极落实街道社区党组织属地管理责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以服务为纽带，将新就业群体有效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三是联通网上和网下。群众在网上，党的工作也要及时跟进到网上。目前各地在党员微信群的基础上，都在探索各具特色的线上党建平台，努力建立起线上全天候、线下零距离的党建服务网络，方便党员群众及时了解社区最新动向，积极参与社区各项活动。

通过共驻共建不断打破横向组织壁垒。一个区域内，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都是做好党建工作的重要主体。然而，一段时间内，街道管街道的、机关做机关的、企业干企业的，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情况比较突出。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街道社区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共同担负起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城市发展的职责，从相互分离走向融合共生，在共驻共建中打造城市基层党建共同体。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单位在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基础上，及时主动与所在街道社区党组织联系，组织抽调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共筑疫情防控“红色防线”，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了更好地打破条块壁垒，深入推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联建，各地通过实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度，吸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建立健全双向压实责任、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双向评价干部等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区域化党建，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共建共享。

通过系统推进不断提升纵向联动成效。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但光靠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是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基层社会和日益增长的群众需求的。城市治理中的很多工作需要动体制、动权力、动资金、动利益，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

□ 郑 琦

必须从更高层面入手，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市、区两级党委要把城市基层党建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通过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或党建工作现场例会制度，及时解决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把人物和权责利对称下沉到基层一线，使基层党组织有能力有条件办事、有能力成事。街道、社区党组织要以做强街道、做实社区为目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调整优化街道的机构设置和职责权限，持续实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度，为社区减压减负的同时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增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只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组织有效联动起来，共同努力，才能为城市基层党建构筑起坚强有力的动力主轴，在新时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提升。

知识链接

城市基层党建：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与传统的街道社区党建相比，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丰富和拓展，更加注重全面统筹，更加注重系统推进，更加注重开放融合，更加注重整体效应。

年轻干部要学会“自找苦吃”

□ 王 雪

《习近平在厦门》一书中，据受访者介绍，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他还进一步谈道，“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并多次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当前，广大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领。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自找苦吃”十分重要。

“自找苦吃”，原意是指自己找麻烦、寻困扰。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自找苦吃”，正如他所言“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是一种以苦为荣、吃苦为乐的乐观

精神境界。“苦”是对环境、形势和局面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个人意志品质的一种检验。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忧患可以励其有为，磨难可以促其有成。年轻干部正值成长黄金期，找到正确的吃苦方式，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磨炼坚强的决心、信心和恒心，提高能力、增强毅力，从而更加快速地成长起来。

回望百年党史，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甘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断“自找苦吃”。他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牺牲时身上却除了一支笔和一块旧表外连一枚铜板都没有的“清贫”的方志敏；他是一个月内暴瘦几十斤，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终于“逃离”海外优渥生

活踏上艰难归国之路的钱学森；他还是退休后婉拒组织安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放着好日子不过”执意回到家乡义务植树造林的“草鞋书记”杨善洲；他更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带头争着抢着干重活、进重症病区的党员医务工作者们。历史告诉年轻干部们，只有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主动“自找苦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打开方式。

年轻干部最应该去哪里“自找苦吃”？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专门指出：“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

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对年轻干部来说，扛几次重活，肩膀就硬了起来；挑几次大梁，责任就担了起来。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多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捧几次“烫手山芋”，是年轻干部去哪里“自找苦吃”的最好答案。

在农民眼中，蹲过的苗，根扎得更深，叶长得更茂。年轻干部的成长也是如此。“自找苦吃”带给年轻干部的是宝贵的知识、技能、经验，是百姓的信任、支持，更是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新征程上，年轻干部需沉下心来、俯下身来“自找苦吃”，读好“无字书”，进好“百家门”，行好“万里路”，在主动迎接挑战、经受苦难挫折中练就过硬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实干中去，为党和人民伟大事业向前推进贡献力量。